

哲学对于促进管理研究的贡献：一些拓展性认识

□ 井润田 朱芙蓉

摘要：本文赞同《哲学对管理研究的作用》一文所提出的哲学在方法论方面对管理研究的贡献，同时也从中西方哲学本体论差异对研究者理论化视角的影响，以及与本体论相适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选择两方面进行了一些拓展性探讨。我们认为，西方的“存在”本体论和中国的“生成”本体论的差异会启发研究者从不同的世界观认识现实社会规律，中国本土文化思维可以给研究者提供更有新颖性的组织与战略理论视角。对应以上不同的本体论，研究者需要在研究方法上区别变异方法和过程方法，进而提出更适宜的研究设计方案。最后，本文对本土管理学者如何更好地运用哲学观点进行管理研究提出了三点建议。

关键词：哲学；管理研究；变异视角；过程视角

一、引言

曾荣光教授在《哲学对管理研究的作用》一文中从方法论和概念论证的角度讨论了哲学对于管理研究的贡献。他首先明确了管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并在这一前提下追溯了西方国家科学与哲学的联系。文章回顾了从以苏格拉底的普遍定义、归纳论证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理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到以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修辞逻辑推理、培根的实验科学、笛卡尔的假设演绎等为代表的科学革命，再到由科学家和哲学家组成的维也纳学派的贡献，阐述了哲学与科学发展是如何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哲学对管理研究的贡献而言，曾教授认为，在方法论上哲学“被用作清洁工，清除通往知识的道路上的垃圾”，帮助人们解决研究过程中的障碍。例如，解释管理研究中的结果复制问题，以及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简化模型的使用问题；在概念澄清与论证方面，他认为哲学可以帮助阐明实质性的概念问题，为理论冲突与

争论提供新的见解。文中列举了创业机会中机会识别和机会创造的例子，通过基于批判现实主义的哲学观对创业机会进行定义和阐释，在本体论上恢复了创业机会的客观性特征。最后，曾教授也为更好地发挥哲学在管理学研究中的作用提供了建议：哲学是非常广泛复杂的学科，研究者应该至少了解一些哲学史，学习几种主要的哲学观点，然后选择其中一种观点作为研究的总体指导。

在《管理研究哲学》一书中，曾荣光教授（2020：10）曾援引 Lawson（2004）一文，指出哲学对于推动经济学研究有三方面功能：①“祛魅”（“揭露、批评及解释无法持续的假定及其所包含的不一致性和混乱之处”）；②“告知”（“帮助研究者弄清其在广阔的知识生产活动领域所处的位置，并帮助研究者知晓他们可以探索的潜在可能性”）；③“方法促进”（“剖析并帮助理解经济学家们或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家们所采用或能采用的方法，从而改进所提供的方法和/或阐明它们的使用条件”）。显然，《哲学对管理研究的作用》一文更多的是从“方法促进”角度探讨了哲学对管理研究的推动价值。的确，很多时候人们认为科学与宗教、艺术等人类活动的显著不同就在于科学家会采用规范的研究方法来探究世界，正如实验对于当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一样。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科学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在于构建理论，哲学在这方面也有其启示价值。科学家们并不只是将实验或观察结果记录下来，他们还需要在经验认识之上构建更

具一般性的理论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这点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重要，“社会科学哲学新的理论定位，直接以具体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为目标，不只限于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普遍指导，而且更专注于反思社会科学学科当中的社会科学实践，以及寻求具体学科本身的普遍原则和理论”（殷杰，2018：3）。因此，本文的评述将主要从哲学本体论对研究者理论化视角的影响以及与本体论相适应的认识论选择两方面进一步探讨哲学对管理研究的推动作用。同时，为了更好地对国内学者有所帮助，我们将聚焦在如何通过中西方不同文化哲学观对话的基础上就以上两方面进行思考和研究拓展^①。

二、建立在不同文化哲学基础上的本体论和管理研究视角

正如曾荣光教授（2020：2）所指出的，“连接哲学和管理研究的路径至少有两条，即本体论和认识论”；其中，“本体论涉及构成现实的实体、实体的分类及其相关关系，而认识论涉及研究者如何获取、形成和证明他们的知识主张”。在本体论上，不同文化哲学对世界存在的事物和关系有不同的假设；来自全球不同地域环境的研究者往往持有不同的文化哲学，他们的研究视角会反映出对于事物存在的不同假设，对其比较和整合也更有可能会揭示出现实复杂世界的不同维度。

^① 考虑读者群体，我们限于“中西方”而非“东西方”文化比较。显然，这样的比较结论很多也适合于东西方情境，因为整个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有很多的共通性。

这里,我们建议把不同文化哲学视为一种思维方式(a way of “thinking”)。正如前期研究所揭示的,在本体论上,中国文化更倾向于以“生成”(becoming)认识事物的本质,而西方文化则更强调事物的存在性(being)本质^①。这里,“存在”是指在与其它实体建立关系之前,存在的一种固定的、确定的、完整的状态或形式,而“生成”是指任何实体在获得其状态或形式之前和之后与其它实体之间的一种相互依赖和互动的过程(Jing & Van de Ven, 2016)。尽管我们采用“生成”和“存在”的两分法对中西方的文化哲学思维进行比较,但这并不代表“生成”哲学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只是这种文化思维在中国社会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确,西方社会也存在这样的“生成”哲学。例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他秉持的就是世界的“生成”本体论,当人们第二次踏入看似相似的河流时,它已经改变了。

当然,总体而言,西方主导性的哲学是建立在“存在”本体论基础上的,它假设现实是原子化个体的集合,其动态特征在本体论上是次要的和派生的,变化是已经预先存在的“事物”状态的改变过程,强调人们在行动之前对事物有一个清晰的认识(Tsoukas & Chia, 2002),即先知后为(knowing-before-acting)。相反,“生成”本体论则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更加处于主导性地位。该哲学观认为,现实是一个不断持续和发生的过程,过程即现

实,变化的过程产生事物。换句话说,“生成”可以看作多种事件或动态存在的共同方式。这种强调过程的“生成”本体论,更加突出行动的重要性,在行动的过程中了解事物(act-to-know),强调通过更加具体的参与而非抽象的建模来理解事物的本质。

与以上“生成”哲学相关,中国文化也构建出很多概念来描述事物的变化规律。例如,“势”这个概念指示的就是促使事物持续变化的一种力量,体现为事物形成过程中的倾向性。这个词很难准确翻译成英文,因为它同时意味着情况、构型、力量、潜力等含义(Jing & Van de Ven, 2014)。同时,这个词的应用面很广,很多领域(战略、政治、体育、美学等)都在使用,使人们可以在跨越各领域之间建立起概念的关联性,揭示其隐含的内在逻辑。然而,目前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本书在理论上对“势”这个词及其应用做出全面解释^②。因此,Jullien和Zarcone(2003)认为,势的逻辑在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只是没有在理论上完全建立起来。

中西方文化哲学的本体论差异也体现在对功效的不同认识上。西方功效观认为,功效源于一种由我们的理解所构想出来的理想形式即所谓的意志或目标带来的力量,用希腊哲学来讲就是“眼睛盯着它”,努力使其成为现实的力量(朱利安,2013)。相反,中国文化则认为在事物和情境不断变化的逻辑中,功效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希望发现什么可以成为结构

① 关于“becoming”的中文翻译,目前学界并无统一标准,词典中多翻译为“生成、形成、成为”之意,本文参见:杨国荣:《存在与生成:以“事”观之》,《哲学研究》,2019年第4期。

② 在《孙子兵法》一书中有一篇(第五篇“兵势篇”)讲述“势”在军事和战场上的应用;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作为一位法国汉学家,著有《功效:在中国与西方思维之间》一书,讲到“势”的功效性理论特征。

的载体，并获得将自身意图被其所承载时带来的力量。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审时度势”的战略独特性就在于启示人们如何开发这种时机带来的潜能。与其努力直接瞄准一种盲目的、变革代价高昂的、需要事物发展来获得的效果，不如启动一个能在功效上展开的生态过程，这样效果就可以自然达到了，不需要太多努力或消耗精力。因此，中国人的功效观是间接的，在该战略指引下人们需要经常反思现实世界的有效性条件。根据中国文化的假设，现实只能从正在进行的过程中产生，而功效只能通过事物的变化倾向性而不是通过目标的投射来实现。

以上不同文化哲学启示人们从不同世界观去认识和揭示现实社会的内在规律。例如，上述的不同功效观对于战争策略的理解有显著差异。作为西方战争理论的代表者之一，克劳塞维茨（1978）认为“战争是一种存在和反应的现象”，直面的实力较量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人们对战争的最初认识都是从纯粹的物质形式（武器、防御工事等）开始的，然后通过建模（如各种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将其理性化。因此，思考战争策略是从理想的作战目标开始，然后根据上述模型制定“战争计划”并实施。然而，从中国文化尤其是《孙子兵法》来看，功效来自具体情境下的作战过程而非理想的作战计划，一旦能够揭示出在具体场景下作战形势发展的承载因素，实际战场上的胜负自不待言（“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战争功效来自于具体情境下形势的布局，而不是靠将领对战争的模型化理解和士兵在战场上的奋力求胜（“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

择人而任势”）。此时，战场上不断变化的环境不再被消极地视为导致计划失败的不确定性因素；相反，环境成为承载战略布局和作战意图的载体。所有影响战争结果的潜在力量都是间接存在的，只有通过影响和构造环境才能渡过难关。甚至，这种间接性功效观将类似勇气这样的军事品质也视为形势的潜在结果而非士兵所固有的个人品质。通过“破釜沉舟”的布局，优秀的将领知道如何利用形势使战士变得勇敢，也同样知道如何剥夺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显然，这也是与前面“生成”本体论相呼应的。整个《孙子兵法》的理念在于，一切布局都在交战之前进行，战斗只是一个已经构建的发展过程自然延展的结果（“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显然，以上“生成”本体论和功效观也可以启示研究者采用与西方主流文献不同的视角来认识或构建组织与战略理论。例如：陈明哲（2016：13-14）认为西方学术界前期对于竞争的认识有偏差，得益于《孙子兵法》关于“曲求”思想的倡导，他主张“对竞争的体会就是学习如何避开竞争、对抗，如何做到不争之争，如何追求仁者无敌的境界”，显然该观点更加强调了竞争优势形成的“相对性”和“动态性”（“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与“生成”本体论一致，这是一种动态的攻防互动分析思维，每一个参与竞争企业都是不同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是动态的和独特的，因此企业没有持久性的绝对竞争优势。作为两位西方学者，Smith 和 Lewis（2011）认为，中国道家的阴阳思维对于说明矛盾悖论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价

值。与建立在西方现有的“存在”哲学基础上的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dilemma）观点，以及消除旧矛盾、产生新矛盾的辩证（dialectic）观点不同，阴阳哲学秉持了矛盾双方辩证统一、不断发展的观点，即事物内部必然同时存在并持续存在矛盾但相互关联的元素，这些元素彼此独立，它们在更大的系统中又相互协同和关联，也由此建立了解释矛盾力量不断运动的动态均衡模型。同样，学者们研究发现，稳定和变化往往是任何组织变革过程中同时存在的两个方面，前期也有大量研究在解释这两个对立概念是如何辩证统一在组织发展的同一时间维度上（Leana & Barry, 2000）。如上所述，“势”概念在这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因为它同时体现出稳定和变化的两个方面，更容易揭示出其中的内在关联性。显然，目前在组织与战略管理领域，“存在”本体论和功效观是主导性范式，绝大部分理论都以该范式作为基础，这也给予“生成”哲学在未来管理研究领域的应用更多的潜力和空间。

三、与不同本体论哲学相关联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

应该看到，建立在不同本体论基础上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也是不同的。《哲学对管理研究的作用》一文从维也纳学派角度探讨了逻辑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等研究方法论的兴起，及其对后期经济管理学研究的影响（如结果复制、检验模型选择等）。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范式都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基础上，体现在关于对立事物存在性“非此

即彼”（either/or）的假设上。然而，“生成”本体论关于对立事物却持“同时或有”（either/and）的假设，例如关于阴阳辩证变化的过程（Jing & Van de Ven, 2014）。相应地，建立在“生成”哲学基础上的是一种过程视角（process-based view）的认识论，这形成了与“存在”哲学基础上的变异视角（variance-based view）不同的研究范式。

以上两种研究视角有不同的认识论基础（Mohr, 1985）。变异视角关注变量关系，从而再现研究对象中重要方面或属性；解释的形式有因果陈述，或将这些变量结合在模型里（如X引起Y，Y引起Z），其隐性目标就是要建立引发结果的必要且充分条件。预测和控制是变异理论的显著优势，这种潜力也使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如此普遍。例如，学者们可以用物体质量和物体间距离来解释两个物体间的引力模型，如波耳定律（温度作用于体积和压力）或欧姆定律（电压和电阻产生电流）。在组织管理领域，学者们可以用企业之间采纳创新的时间差异、对创新的投入程度等变量来衡量和反映技术创新的扩散速度。变异理论研究的是动力因（efficient cause）。动力因作用于分析单位（个人、组织等），使其成为结果变量（士气、效率等）或改变其原有状态，被视为推进式因果关系。每个动力因无论是作为一个附加影响因素单独存在，还是与其他原因共同存在，都对结果产生影响，其影响程度并不会因为原因和条件的相互作用而消失，各个独立自变量之间的时间顺序也不会影响结果。这导致时间结构及其内在的不确定性在寻找经验规律和模型的解释中容易被忽略，“在什么时间”和

“在什么背景下”等变化的理论很难用以上动力因的命题语句来表述 (Langley et al., 2013)。

相反，过程视角则以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按照事情发生次序及其发生所处的过程阶段，来建立解释发展过程的生成机制，主要关注“发生了什么”“发生的方式”等。通常，过程模型关注的是一系列离散事件的发生，而非变量间关系。过程研究中有三个核心要素：①必要条件。与变异视角不同，这里先导因素 (X) 只是结果 (Y) 的必要条件。②外部导向力。其作用是以特有方式引导研究单元和条件，使其相互接近和相互作用。③过程机制 (Mohr, 1985)。研究者需要采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目的因 (final cause) 揭示出将这些离散性事件组合的潜在的发生机制，这里隐含的意思是每个离散状态都给出了事件发生的目的。在过程模型中，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通常对结果至关重要。每个事件的概率过程输出取决于输入，而输入总是取决于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因此模型必须如实体现出时间顺序。

显然，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个建立在“生成”哲学观基础上的组织管理问题，上述的过程视角就比变异视角更加切合。Jing 和 Van de Ven (2014) 采用过程视角对成都公交集团的组织变革进行了本土化理论构建研究。成都公交集团是一家地方公共运输公司，在改革之前一直面临旗下五家公交公司同时经营、抢站抢客、管理混乱、社会公众不满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新任董事长陈蛇认为：“变革者遇到棘手的问题时，最好不要直接改，可以通过制造一个问题而构造出更有利的变革环境。”经过深入思考，他经由五个连续发生的变革事件实现了改革目

标：①买回外部股份。通过大幅降低公交票价引发“价格战”，迫使竞争对手出让股权给成都公交集团。②优化公交线路。回购外部股权后，统一调度、合理配置线路资源，提升运营效率。③组织结构优化。整合了维修公司以保障公交车的高效运营，新增广告公司提升公交车广告收入，同时整合下属单位和分支公司财力。④薪酬方案调整。通过岗位轮换调整了不公平的工资制度，将工资与“累计安全里程”和事故发生次数挂钩以提升安全意识。⑤提升外部形象。通过普通员工与管理人员相同的节日福利来提升公司士气，打造公开、公平和开放的企业文化，提升了现代化和国际化服务质量和水平，打造积极的社会形象。最终，成都市延续六年的公交线路恶性竞争的格局被成功解决。

如上所述，过程研究需要回答三个核心问题：①必要条件。以上五个变革事件相互衔接，在时间上每个事件的结果为下一个事件的发生创造了前期条件，同时在先导事件无法自然引发结果时，变革者还会通过改变生态因素的方法（“造势”）构建出让下一个事件自然发生的形势。②外部导向力。正如陈蛇上述引语所表述的，领导者提前布局形成的组织势是影响变革相关利益群体集体行动的外部导向力，而不是计划式变革理论所强调的领导者教育和改变员工的行动。③过程机制。这是研究理论贡献的集中体现，具体反映在论文构建的概念模型中：变革推动者如果能将“造势”“无为”“应势”的策略与形势有利情况的变化节奏保持同步，那么就更有可能会取得变革成功；领导者应当尽可能减少对于变革过程和员工行为的直接干

预。显然,以上过程研究设计更好地体现出建立在“生成”哲学观基础上的组织变革过程,以及与间接性功效观相关的变革者角色和作用。因此,选择与本体论相适合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研究设计的基础,尽管很多时候研究者在自然接受的哲学观驱使下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四、对本土管理研究的启示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就国内学者从事本土研究时哲学可能产生的启示和影响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一) 从哲学而非理论角度思考本土研究的基本假设

哲学是隐含在理论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认识和行动背后的基本假设,可以体现在本体论上(如“存在”或“生成”),也可能体现在认识论上(如“变异视角”或“过程视角”)。文化心理学家认为,历史文化是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长期在一个地域环境中生活的产物,反映的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手段。Nisbett(2003)在《思维的地理性:亚洲人和西方人的思维如何不同……又为何不同》一书中,比较了拥有10亿以上人口影响力的希腊文化,与拥有20亿人口影响力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他发现,在整个希腊的文化里,人们有非常强烈的关于个体能动性(agency)的信任,相信自身对命运的把握所体会到的行动自主权往往更高。同样,希腊神话以史诗为纽带,以叙事方式哺育了英雄主义的理想,这与前述的理想范式驱动的领导者功效观一脉相承。然而,中国文化反对这样的现实考虑,认为太强硬的

直接行动必然干扰事件的自然进程,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以及人和环境之间和谐才是行动的根本出发点,这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功效观。

以上文化观念影响的不仅是理论研究者,也包括管理实践者。相应地,国内学者在从事本土研究时,很容易发现管理者的行动与现有文献之间的差异性,也很容易就此提出一个改进的理论模型。然而,正如陈蛇在成都公交集团的变革实践,他们头脑中秉持的很可能是与现有组织变革理论(如计划式变革)完全不同的基本假设,此时我们需要在更深层次的哲学观上去理解他们的行动。

目前,主流的管理研究大多数遵循西方的范式,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哲学。如果中国的管理研究学者一直追随西方,对原有的西方的理论进行完善,模仿西方的研究方法,套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现象,会造成理论与实践的差距越来越大。理论源于实践,每个理论都有其产生的文化背景,本土的管理理论应该深深根植于本土的企业管理实践,这种实践为本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情境。研究必须考虑文化根源的影响(Tsui, 2004),否则很难反映问题的本质,从而丧失了做更好研究的机会。从中国本土情境中丰富的哲学思想出发而非从西方现有的主流的理论出发,可以帮助我们挖掘更多新颖的、原创的、有价值的、与实践情境一致的本土理论(卢芳妹等, 2013)。

不可否认,就如《哲学对管理研究的作用》一文中提到的,西方的哲学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有理由肯定并遵循西方的哲学思想。但是也应该看到,“存在”

本体论基础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并不能帮助我们解释现实中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关于不确定和变化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运用“生成”的思维方式和过程研究方法。例如，当我们更关注某个事件的演化现象和过程时，可以通过收集纵向数据来观察其如何产生和演化，归纳其过程模式和对应结果（Jing & Van de Ven, 2016）。

（二）加强不同哲学背景下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来自不同文化情境下的学者会有不同的哲学观点，对于事物的存在与关系的认识会存在差异，这种哲学背景的差异，可能并不是十分直接的，而是环境对于每个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反映出一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例如，一直都在西方、一直都在中国本土、中西融合这三类学者的哲学思想可能是存在明显不同的。要想实现中西哲学思想的融会贯通运用，以更好地促进科学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交流碰撞。正如法国哲学家朱利安（2013）谈到的，中国可以作为哲学研究的工具，中国思想最有可能实现将哲学重新整合，真正的“希腊对应物”很可能在中国文化里找到，这可以帮助学者从习以为常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哲学中脱离出来，超越那些“存在”哲学所认为是绝对的思想范畴（实体、量、质）进行思考。换句话说，中西方文化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互补的。

（三）推动与本土文化相适应的方法论建设

目前，国际范围内学者们也越来越多意识到“生成”哲学观对于组织管理研究的重要性。与之相应，Andrew H. Van de Ven、Ann Langley等学者提出“过程研究方法”，并逐渐成为组织

和战略管理研究领域对案例事件及其组合出的过程模式进行呈现和归纳的重要方法。《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曾就此研究方法征集论文专辑（Langley et al., 2013），并在美国管理学年会上连续三年举办这方面的专业发展工作坊（PDW）。尽管学者们在过程研究方法开发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但总体而言该方法相对于变异研究方法建设还非常薄弱。本文在这方面也提出以下建议：

- ①在进行过程研究时，要正确认识过程视角与变异视角的差异性，注意过程视角的三个核心问题，进而建立更高质量的过程研究设计方案。
- ②运用本土文化思维优势开发和完善相关方法。要深刻理解文化思维对于方法论建设的影响，例如中国文化中的整体性、生成性思维就要求我们用整体的和变化的而非简单线性的观点看问题，未来我们需要运用该思维优势进一步开发和完善目前尚处于发展期的过程研究方法。
- ③开展研究方法培训和研讨。对于研究方法的熟悉掌握需要不断地学习、运用和探讨，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方法论体系的建设与不断发展。目前以案例研究、扎根理论、定性比较分析（QCA）等为代表的定性研究方法正在得到国内学者重视，这方面也有一些培训会议和学术社区。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关于过程研究、与中国文化思维同根同脉的研究方法研讨和培训，通过大家的群策群力，共同推动本土管理研究方法建设。

五、结束语

正如 Poggi（1965：284）所言，“一种看问

题的方式往往意味着一种看不到问题的方式 (A way of seeing is a way of not seeing)。”研究者往往无意识地会延续自身习得的或相信的哲学视角,并将其应用在自身的管理研究中。考虑到哲学观在研究过程这种先入为主的假设特征,不同文化哲学更容易启发我们看到自身思维习惯中的盲区,找到解释矛盾现象的创新性框架。当我们时时在为自己的研究困于现有文献框架而找不到理论创新点时,哲学在帮我们打开一扇窗,让我们看到新的视野。当然,基于对本土管理研究的关注,本文更多是站在中西方文化哲学的比较基础之上。事实上,哲学本身就存在很多的分支和学派,如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批判实在论、实用主义等,研究者完全可以在比较这些不同哲学观点的基础上找到审视和延展现有理论的更好视角。以上都是在受邀评述曾荣光教授《哲学对管理研究的作用》一文时想到的一些拓展性认识,在此也对曾教授在该领域的持续投入和启发性成果表示感谢。

接受编辑: Haiyang Li

收稿日期: 2021年8月25日

接受日期: 2021年11月10日

作者简介:

井润田,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首届中国管理学青年奖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兼任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副主席、中国管理学会组织与战略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管理学季刊》联席主编。长期从事组织变革、领导行为等方面的研究。

朱芙蓉,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组织成长、战略领导力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曾荣光 (Eric W. K. Tsang): 《管理研究哲学》,任兵、袁庆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 [2] 陈明哲: 《学术创业: 动态竞争理论从无到有的历程》,《管理学季刊》,2016年第3期。
- [3] 弗朗索瓦·朱利安: 《功效: 在中国与西方思维之间》,林志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 [4] 井润田、耿菊徽: 《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知识》,《管理学季刊》,2018年第2期。
- [5] 井润田、孙璇: 《实证主义 vs. 诠释主义: 两种经典案例研究范式的比较与启示》,《管理世界》,2021年第3期。
- [6] 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 [7] 卢芳妹、井润田、尹守军: 《中国管理本土研究的困境与路径》,《管理学报》,2013年第12期。
- [8] 杨国荣: 《存在与生成: 以“事”观之》,《哲学研究》,2019年第4期。
- [9] 殷杰: 《引言》,载马克·里斯乔德: 《当代社会科学哲学导论》,殷杰、郭亚茹、申晓旭译,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 [10] Jing, R., & Van de Ven, A. H. 2014. A Yin-yang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Chengdu bus group.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0 (1): 29-54.
- [11] Jing, R., & Van de Ven, A. H. 2016. Being versus becoming ontology of paradox management. *Cross Cultural & Strategic Management*, 23 (4): 558-562.
- [12] Jullien, F., & Zarcone, T. 2003. China as philosophical tool. *Diogenes*, 50: 15-21.

[13] Langley, A. , Smallman, C. , Tsoukas, H. , & Van de Ven, A. H. 2013. Process studies of change i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Unveiling temporality, activity, and flow.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6 (1): 1-13.

[14] Lawson, T. 2004. Philosophical under-labouring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economics: Aiming at truth and usefulness in the meanest of ways. In John Bryan Davis, J. B. , & Alain Marciano, A. (eds.). *The Elgar Companion to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317-338.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15] Leana, C. R. , & Barry, B. 2000. Stability and change as simultaneous experiences in organizational life.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5 (4): 753-759.

[16] Mohr, L. B. 1985. Approaches to explanation: Variance theory and process theory. *Explain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7] Nisbett, R. E. 2003.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 and Why*. New York: Free Press.

[18] Poggi, G. 1965. A main theme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analysis: Its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6: 283-294.

[19] Smith, W. K. , & Lewis, M. W. 2011. Toward a theory of paradox: A 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 of organizing.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6 (2): 381-403.

[20] Tsoukas, H. , & Chia, R. 2002. On organizational becoming: Rethink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Organization Science*, 13 (5): 567-582.

[21] Tsui, A. S. 2004. Contributing to global management knowledge: A case for high quality indigenous research.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1 (4): 491-513.

Contribution of Philosophy to the Promotion of Management Research: Some Further Understandings

Runtian Jing Furong Zhu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agrees with the view-point about methodological contribution of philosophy proposed in “Why Philosophy Can Help Management Research” to management research. On this basis, we have carried out some expansive discussions from two aspects: The influence of the ont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on the theorizing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ers, and the choice of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that follows the ontology. We believe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estern “being” ontology and China’s “becoming” ontology will inspire researchers to understand the laws of real society from different worldviews.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indigenous cultural thinking can also provide researchers with a more novel perspectiv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and strategic theories. Corresponding to the above different ontologies, researchers ne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variance-based view and process-based view in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n propose a more appropriate research design plan. Finally,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ree suggestions on how local management scholars can better use philosophical views to conduct management research.

Key Words: philosophy; management research; variance-based view; process-based view